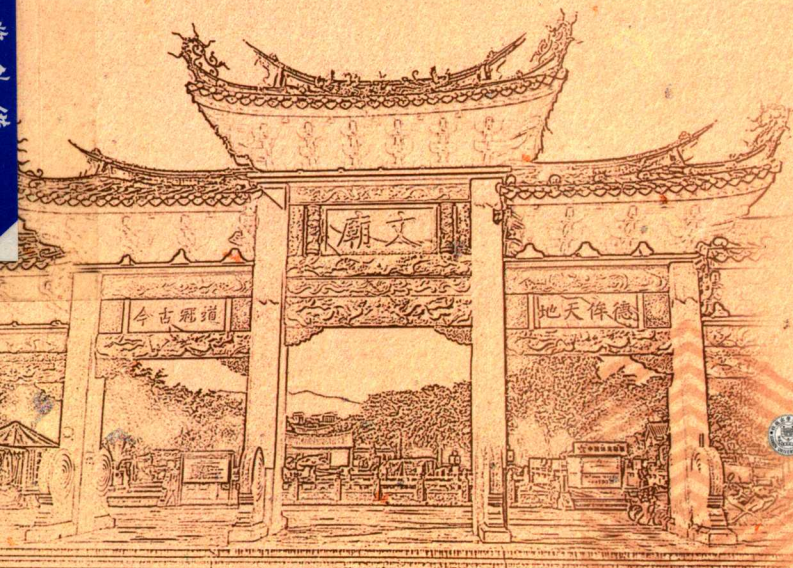




泉州 多元文化 和谐共处探微

林振礼 吴鸿丽 主编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林振礼 吴鸿丽 主编

泉州多元文化 和谐共处探微

QUANZHOU DUOYUAN WENHUA HEXIE GONGCHU TANWEI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林振礼,吴鸿丽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615-6506-3

I. ①泉… II. ①林… ②吴… III. ①地方文化-多元文化-研究-泉州

IV. ①G127.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2029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封面设计 蒋卓群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泉州刺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9

插页 2

字数 480 千字

印数 1~1 500 册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项目（11BZJ036）资助

泉州师范学院中国史重点学科“协同创新”项目资助

泉州通淮关岳庙董事会“宗教学”项目资助

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

编委会

顾问单位：泉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

主任：吴金炎

委员（课题组成员暨撰稿人，排名不分先后，
以承担章节为序）：

吴幼雄	林振礼	李静蓉	洪峻峰	郭志超
李玉昆	何隽彦	吴 玫	李国宏	黄海德
陈名实	陈彦军	丁玲玲	粘良图	林国平
陈桂炳	连心豪	吴鸿丽	范正义	何振良
吴力群	黄 坚	郭阿娥		

主 编： 林振礼 吴鸿丽

序

2017年2月,泉州正式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泉州(刺桐)史迹”,申报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再次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响亮名片。“古泉州(刺桐)史迹”将有望成为我国第53项世界遗产,这标志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之路正式迈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大步。林振礼、吴鸿丽主编《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一书,在这一特殊时间出版,可谓恰逢盛时。

“古泉州(刺桐)史迹”系列遗产(16处),是泉州在宋元时期(960—1368)以“刺桐”为雅称,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繁盛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遗留至今的与海洋商贸、海洋文化相关的诸多史迹和遗址。

古代,泉州盛产刺桐花树,被唐代诗人誉为“猗猗小艳夹通衢,晴日熏风笑越姝”。因此,泉州别称刺桐城。13世纪时,波斯人最早译称泉州为刺桐城(Zayton),它恰好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盛产油橄榄(Zaytun)的波斯语同音,所以才引起14世纪摩洛哥大游历家伊本·巴都他的误解,误以“刺桐”为波斯语,而发出“此地并无橄榄……然有此名,诚不知何故也”的疑问。人们可曾知道,泉州唐代盛产的刺桐花树,竟然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进的,自唐初就被人们认为可以“兆年丰”,而被作为“祥瑞”的外来物种广泛种植。可见,“刺桐”别称得名也源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十分悠久,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它构成泉州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世纪时,西亚和欧洲长期陷入宗教冲突和战争,而在东亚的中国泉州,世界各种宗教却可以和平相处,泉州发展成为与埃及亚力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贸易港。这似乎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生活在21世纪的泉州人,往往还以此为荣耀呢。但是,人们是否了解什么原因造就世界多元宗教文化在泉州历史上长期和平共存、共荣呢?《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一书,就是为解答这一难题而作的。

本书从缙绅、官府和社会民众两个层面,剖析历史上泉州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本书以无可辩驳的史实,从哲学思维的高度,用多维视

角探寻,统揽纷繁复杂的资料,层层剖析,分类归纳,圆满地回答了中古泉州存在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汇聚了多国家、多地区、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即多元一体文化的事实和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的难题。

从官府、缙绅层面看,本书揭示外来宗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有最大的共同处,那就是都“敬天、奉天、法天”,都“凡有功于民则祀之”,都“笃志好善,引导善类,敬天事上,益效忠诚”,“于世风大有裨也”。这便是“万殊一本”的哲学理念,即以“一本”的儒家思想,兼容、海涵“万殊”的世界多元宗教文化。

从社会民众层面看,一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儒、道、释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无微而不至,无远而弗届地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角落。佛教最早融入中国社会,深深植根民心,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各门宗教(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纷纷传入,各门外来宗教为了在泉州取得立足点,也调整了自己,以本教的主神称“佛”,而为泉州社会民众所接受。所以,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世界多元宗教文化,以“佛”为媒介和谐共处的一种特殊多元一体文化现象。

此外,泉州还有一种特有文化现象,那就是各种民间信仰的忠义、佑民神明,也都被民众称为“佛”而尊奉,“佛”的祀祭节日被称为“佛生日”。而官府和缙绅,也以这些“神明”有功于民为由,而加以倡导、申报;朝廷则“赐额”、“赐号”以提高其地位。如此,则政权、神权和民意高度结合,使社会和谐。且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南音、南戏、武术、歌伎、工艺,以及民俗,都以“佛生日”为载体,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本书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在泉州表现的广纳百川,它提供世界多民族和多元宗教文化“各美其美”的场地,又提供“美人之美”的平台。它是世界多元一体文化和谐共处的典范,它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儒家“万殊一本”、“万道归一”的理念。这便是泉州多元一体文化和谐共处的思想源泉。

泉州多元一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犹如一株参天大树,散开来,千枝万叶,万紫千红;合起来,则是一株,万殊一本。从深远想,实妙意无穷;就浅处看,乃通俗易懂。

在《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一书付梓前夕,应主编盛情邀约,为本书主旨与内容作简要介绍,是为序。

吴幼雄

2017年3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林振礼 李静蓉/1
第二章 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泉州访古与《泉州宗教石刻》	26
第一节 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泉州访古与研究	洪峻峰/26
第二节 《泉州宗教石刻》:宋元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的 历史见证	林振礼/37
第三节 《泉州宗教石刻》的面世历程与创新	郭志超/43
第四节 吴文良先生: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 开拓者	李玉昆 何隽彦/55
第三章 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探微(上)	62
第一节 泉南佛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吴幼雄/62
第二节 泉州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	吴幼雄 吴 玫/71
第三节 从清源山碑铭看泉州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处	李玉昆/80
第四节 泉州寺庙奉祀神祇与多元宗教文化	李玉昆/90
第四章 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探微(下)	99
第一节 《重修丰山寺叙》的“和”文化观解读	李国宏/99
第二节 苏廷玉与《重建泉州元妙观记》	黄海德/105
第三节 婆罗门教的传入和泉州的印度教寺	吴幼雄/118
第四节 泉州锡兰王裔和遗址发现记	吴幼雄/127

第五章 泉州多元宗教和谐之本:宋明儒教	138
第一节 朱熹与闽南多元宗教	林振礼/138
第二节 泉州府学、石笋之变迁及中外“文化接触”	林振礼/153
第三节 从郑成功“释辅儒宗”政策看儒佛和谐	陈名实/162
第四节 泉州关帝信仰的理学文化意蕴	林振礼/169
第五节 重建之根:儒教视域里的萧太傅信仰研究	陈彦军/178
第六章 从泉州伊斯兰教看多元宗教和谐共处	194
第一节 泉州伊斯兰教文化遗存及其现代价值	吴幼雄/194
第二节 泉州丁氏回族宗教信仰的多元兼容	丁玲玲/207
第三节 白奇回族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	郭志超/216
第四节 泉州清净寺重修《募缘疏》和《碑记》的 儒道文化渗透	吴幼雄/226
第五节 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的实质	吴幼雄/230
第七章 从泉州基督教看多元宗教和谐共处	240
第一节 泉州景教石刻艺术的佛教元素	李静蓉 林振礼/240
第二节 元代泉州基督教天使雕饰的多元文化选择	李静蓉/251
第三节 泉州基督教石刻有翼形象的比较研究 与文化来源	李静蓉/260
第四节 元代泉州基督教丧葬艺术的多元融合	李静蓉/268
第八章 从泉州摩尼教看多元宗教和谐共处	278
第一节 泉州晋江草庵罕见的摩尼教遗存	粘良图/278
第二节 从草庵签诗看摩尼教与民间信仰的结合	粘良图/290
第三节 闽南晋江与闽东霞浦两地明教史迹比较	粘良图/303
第四节 关于泉州明教几个问题的考释	吴幼雄/314
第九章 从泉州民间信仰看多元宗教和谐共处(上)	322
第一节 “闽南”小考	林国平/322
第二节 关于民间信仰概念的思考	陈桂炳/331
第三节 闽南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	陈桂炳/339

第四节	韩元吉《东岳庙碑》与泉州民间信仰	连心豪/349
第五节	从泉州天后宫看民间宗教的和谐发展	陈名实/355
第十章	从泉州民间信仰看多元宗教和谐共处(下)	365
第一节	祷雨:协调人与自然和官民关系的 祭祀活动	李玉昆 何隽彦/365
第二节	民间关帝信仰与社会需求的 随机调节	吴幼雄 吴 玫/374
第三节	从通远王崇拜看泉州神缘与商缘的和谐互动 ...	吴鸿丽/384
第四节	泉州三座临水夫人宫庙的现状调查 ...	范正义 何振良/391
第十一章	泉州宗教文化生态及其文化走向	400
第一节	泉州宗教生态的多样性	吴力群/400
第二节	从闽南民间雕刻看多元宗教文化的影响	黄 坚/412
第三节	关帝信仰与闽南文化的融合	吴鸿丽/425
第四节	泉郡富美宫与泉台王爷信仰交流	丁玲玲/432
第五节	闽台关帝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	范正义 郭阿娥/441
后 记		林振礼 吴鸿丽/453

第一章

绪 论

林振礼 李静蓉

(泉州师范学院;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世界上有两座典型的宗教城,一座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由于战乱频繁,十八次被夷为平地,又十八次复建。另一座是泉州,它没有像耶路撒冷那样意为“和平之城”,却赢得了和平。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来泉州考察(在中国8天,其中广州2天,泉州6天)。考察团总领队杜迪安博士说:“我们看到泉州是一个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相遇、文化交流和和平共处的城市。”^[1]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设在泉州。2013年6月18日,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走近泉州》首发式,该书作者恩勒特站在全球文明视野的高度,分析了世界各地不同宗教的冲突,对闽南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这一独特现象赞叹不已。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在海外交通鼎盛的宋元时期,就有多种外来宗教聚集在这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考察泉州时指出,泉州历史上有个“中外文化接触”问题,必须深入研究。换言之,费老所倡导研究的就是“多元文化接触”,亦即“多种宗教并存”问题,这是泉州历史文化的特质。由于西方历史上于11世纪末爆发了十字军东征——一场旷日持久的典型宗教战争。这种在几乎相同的时间跨度内发生于不同的空间地理位置的历史现象:血火冲突之杀戮与多种宗教同生共存的巨大差异,对于我们研究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多种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这需要大量的宏观分析与微观论证。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借鉴。保存于泉州的多元宗教石刻及史迹,回应并批驳了“文明冲突论”的宗教归因,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化发展提供了“泉州经验”。

本书的形成,缘起于2011年7月正式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闽南泉州

多元宗教和谐共处探源”(11BZJ036)项目。5年多来,课题组全体成员竭尽全力,在潜心撰写论文的同时,于2012年11月举办“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学术研讨会”,2013年11月举办“近百年泉州宗教学回顾暨纪念吴文良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将两次研讨会所遴选论文结集刊印。以下是泉州宗教学术史回顾与全书之提纲挈领。

一、泉州宗教学研究回顾

泉州是福建东南沿海的著名港口,是中国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泉州一直扮演着世界文化交流重要枢纽的角色。经由海路与陆路传播的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宗教文化,堪称泉州多元文化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泉州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各种外来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在这里与中国的儒、释、道以及泉州的本土信仰相遇,和睦共处,至今仍星罗棋布在泉州各个角落的各种宗教遗存与宗教寺庙就是最好的见证。

正是泉州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吸引了海内外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艺术学家等接踵而至的研究,也推动了“泉州学”研究的发展。“泉州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宗教史迹的丰富是重要的因素。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以至于基督教、道教的有形无形的遗存,都是泉州历史文化辉煌表现的一部分,也正是提供‘泉州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2]真正意义上的泉州宗教学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历时近百年,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一)考古调查与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泉州宗教就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尤其是摩尼教。1923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根据陈垣引录的《闽书》“华表山”的资料,在《通报》上发表《福建摩尼教遗迹》,考证华表山的地理位置应在泉州南部20公里处。伯氏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昭示了草庵遗存下来的可能性,从而把其推入考古、文博专家的视野。^[3]真正开始对泉州宗教遗迹进行系统考察的应该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6年,聘任了沈兼士、林语堂、鲁迅、顾颉刚、张星烺和陈万里等一批著名学者。他们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认为不能局限于古籍研究,提出在古

籍研究之外进行考古实物和实地考察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邻近厦门而文物古迹盛多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便成为厦门大学国学院学者访古考察的首选地点。以顾颉刚、陈万里、张星烺为代表的厦大国学院学者对泉州的考察以及研究成果,可以视作“泉州学”研究的起点。他们的考察内容涉及蒲寿庚、留从效、郑成功和施琅等泉州历史文化名人,清净寺、先贤墓、郑和行香碑等泉州文化古迹,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景教、圣方济各会、耶稣会、密宗等宗教和教派在泉州的传播等;研究成果有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德国学者艾克(Gustav Ecke)合著的《刺桐双塔》,张星烺的《中世纪之泉州》、《泉州访古记》,陈万里的《闽南游记》,顾颉刚的《泉州的土地神》、《天后》,艾克的《福建闽南的两座方形石塔》、《刺桐的花岗岩石碑断片》等。^[4]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存续时间不长,但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当年的考察以及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至今仍是泉州学研究的热点。继他们之后,厦门大学的韩振华、庄为玑等学者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泉州宗教方面的研究文章。^[5]

(二) 碑刻收集与研究

如果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创了泉州宗教研究的先河,那么吴文良先生则当之无愧是泉州宗教研究的奠基人。当张星烺等人对泉州访古调查之时,吴文良尚在厦门大学读书,深受老师们的感染和影响,自1928年至1969年40多年的岁月里不遗余力地献身于泉州宗教石刻的搜集整理和宗教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尤其是1957年《泉州宗教石刻》的出版,是“极为重要的文献”,“是有关外国人遗物最有系统、最全面的集成”,是世界了解泉州的桥梁,^[6]奠定了吴文良作为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开拓者的重要地位。从此,吴文良作为考古学家和文物收藏家为国际学术界所知悉,他的专著是研究宗教文化的重要参考工具,他对泉州文化的热爱程度和研究精神至今无人能企及。吴文良在泉州宗教研究领域创造了许多“第一”:他第一个收集宗教墓碑;他第一个提出宋元时代泉州有两座清净寺的观点;他第一个提出元代泉州有婆罗门教寺院和祭坛的看法;他首次论证泉州存在番坊等。^[7]他的学术贡献如此之大,如果没有他的收集成果,后人的研究就无以为继,许多历史真相无以为据,如泉州作为世界大港的地位、泉州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泉州是中世纪基督教的传播中心之一等历史迷雾,正是有赖于吴

文良对宗教石刻的收集才有实物证据,而不是仅停留在只言片语的材料而受人质疑。限于当时条件,吴文良的一些观点也许还不够成熟,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抛砖引玉之鉴启迪后学。

泉州师院吴幼雄教授以继承其父遗业为己任,历经40多年的刻苦努力,对《泉州宗教石刻》进行大规模的增订,200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增订本汇集了泉州发现的古代宗教建筑和坟墓的石刻遗物,内容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佛教、道教以及其他石刻,实物图版比原著增加三倍多,文字增加四倍多,增加了许多碑刻的文字释读和考证。^[8]增订本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宗教信仰的传播与交流等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泉州及其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古泉州(刺桐)史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值得一提的是,《泉州宗教石刻》从收集、整理到出版,再到增订,与林惠祥、夏鼐、郑振铎、陈梦家、黄展岳等前辈诸贤的关心与指导分不开,泉州宗教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理论建设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泉州学研究热起来了,泉州宗教研究热起来了,可是泉州学术界许多人却感到迷茫。尽管泉州学研究已经取得不少的成就,可是泉州学在“概念上一直是模糊的,在实践上是混乱的,在研究方法上是陈旧的,在学术视野上也是比较狭窄的”^[10]。在1999年海峡两岸“泉州学”学术研讨会上,祖籍泉州的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作了《“泉州学”的新视野》^[11]专题演讲,精辟地阐述了“泉州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明确指出“泉州学”是“一种以泉州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科际综合学问”,“泉州学”的基本精神是“辨明泉州文化的特色”,其中泉州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大小传统的关系等开拓了泉州学研究学人的眼界,也明确了泉州学研究的方向。可以说,李亦园先生建立了“泉州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泉州宗教学研究是泉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李亦园的泉州学理论指导当然也适用于泉州宗教学的研究。他在《“泉州学”的新视野》中对泉州宗教的研究作了具体指引,指出宗教遗存是“泉州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并强调研究泉州民间信仰的重要性,“民间信仰的现象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宗教的问题,但是深层次去理解,它又牵涉到最根本的宇宙观、人际关系、做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因为在表现地方文化特性上最为深

刻、常常能引发一套宗教与文化理论的论述,何况民间信仰也与现实的经济发展有其微妙的复杂关系”。之后,李亦园多次参加泉州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他的报告《试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内在意涵》、《从“海滨邹鲁”到“海滨中原”——闽南文化的再出发》、《全球化、人类学与中国文化》等都对“泉州学”研究的理论作了补充和完善,也是泉州宗教学研究理论阐述的进一步发展。他从全球的视野出发,指出泉州宗教文化“兼容并纳,各美其美”、“百教并存,万神归宗”等特点对世界和平、人类和睦相处有借鉴意义。他将世界各宗教分为“断裂的人神关系”与“连续的人神关系”两大类,以此探讨宗教信仰的包容与排斥。^[12]

李亦园先生关于泉州学研究的某些观点受到了他的挚友费孝通先生的影响。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没有直接指导过泉州学的研究,但他的“多元一体”、“中外文化接触”等观点却对李亦园的泉州学理论构建产生影响,也为泉州学者思考宗教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的理论虽然是立足中国文化思想得到的灵感,却对研究世界文化交流有指导意义。“多元一体”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指出人类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应该互相容忍、互相沟通、互相尊重、互相欣赏,才能达至大同,这就允许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文化共存,人类的世界才能永续发展。“中外文化接触”的提出其实是“多元一体”理论的延伸,他认为文化接触要得到一个积极性的结果,必须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相处,互相理解,取长补短,最后走向互相融合。^[13]泉州曾是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交会的中心,存在着中外文化接触和多元共存的现象,因此费先生的理论观点对泉州学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研究现状

泉州宗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泉州宗教不仅有儒、释、道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融入了不少闽越先民的信仰;与其他沿海城市相比,又是世界各大宗教汇聚的地方。泉州本土也产生了许多特有的神灵崇拜,各种各样的信仰在这里相遇、碰撞、融合,又产生了新的现象。从数量来说,泉州寺庙及供奉的神明之多也是十分罕见的,仅民间信仰宫庙有 6000 多座,主祀的神明不少于 500 种。^[14]从双向传播的角度看,泉州宗教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以同时容纳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另一方面泉州宗教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传播能力,这与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

分不开,泉州宗教伴随着商人以及华侨华人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泉州宗教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也异常广泛,研究泉州宗教必然要涉及考古、民族、民俗、艺术、建筑、音乐、戏曲、语言等方面,这二三十年来,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和研究泉州宗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多元宗教方面的综合研究,主要有吴幼雄的《泉州宗教文化》(鹭江出版社,1993年)、《闽南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处探源——以泉州为例兼谈闽南文化生态保护》(《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吴幼雄通过多年的观察与研究探讨泉州多元共存的原因,认为各宗教和民间信仰能够在泉州共存共荣的原因主要是宗教与民间信仰借“佛”立足和发展,又通过“佛生日”的民俗祭祀仪式产生广泛影响。然而,归根到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兼容与并蓄。^[15]吴幼雄的观点其实是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的具体体现,费先生提出“多元一体”局面的形成有个从分散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这过程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16]吴幼雄认为,泉州宗教多元一体局面的主导因素就是中国的儒家传统。兼容并蓄是中国儒家传统的精髓,这个特性使儒家能够凝聚、吸纳不同的文化,允许多样性。林振礼则进一步申论,宋明新儒学的“理一分殊”说,是吸纳不同的文化,兼容多样性的理论基石(本书第五章)。

按宗教类别独立研究的专著主要有王寒枫、曾秀川合编的《泉州开元寺奇观》(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郑国栋、林胜利、陈垂成等编的《泉州道教》(鹭江出版社,1993年),粘良图的《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范正义的《众神喧哗中的十字架:基督教与福建民间信仰共处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的《泉州伊斯兰教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泉州伊斯兰史迹保护委员会编的《泉州伊斯兰教史迹》(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的《三藏法师》(研究泉州东西塔雕刻人物及佛传故事,集英社,1986年)等。论文方面主要有庄为玠的《泉州摩尼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李玉昆的《福建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20世纪福建摩尼教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福建宗教》1994年第1期),瑞典学者翁拙瑞(Peter Bryder)的《我对晋江摩尼教草庵的考察》(《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英国学者刘南强(Samuel Lieu)的《华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林悟殊译,《海交史研究》1978年第2

期),黄世春的《福建晋江发现“明教会”黑釉碗》(《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林悟殊的《福建发现的波斯摩尼教遗物》(《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第12期),《泉州摩尼教渊源考》(《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元代泉州摩尼教偶像崇拜探源》(《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泉州“摩尼教墓碑石”为景教墓碑石辨》(《文物》1988年第8期),林振礼的《朱熹与摩尼教新探》(《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德国学者廉亚明(Ralph Kauz)的《中国东南摩尼教的踪迹》(《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夏鼐的《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1年第1期),吴幼雄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期),以及杨钦章和牛汝极关于泉州基督教研究的系列论文。^[17]另外,美国学者 Risha K. Lee 的博士学位论文《社区建构:印度与中国的泰米尔商人寺庙(Constructing Community: Tamil Merchant Temples in India and China, 850—1281)》(Columbia University, 2012)中的中国部分主要以泉州的印度商人为研究对象,并试图根据泉州出土的印度教石刻复原泉州印度教寺庙的建筑。

泉州民间信仰早就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李亦园也多次强调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性。这方面的主要专著成果有李玉昆的《泉州民间信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陈桂炳的《泉州民间信仰》(九州出版社,2012年)和《闽南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以闽南及台湾地区为研究视野》(方志出版社,2010年),连心豪、郑志明的《闽南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林国平、彭文字的《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闽台民间信仰源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段凌平的《闽南与台湾神明庙宇源流》(九州出版社,2012年),李天锡的《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郑镛的《闽南民间诸神探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谢重光的《闽粤台民间信仰论丛》(海洋出版社,2012年),等等。以个别神灵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黄炳元的《泉州天后宫》(泉州闽台关系史博物馆、泉州天后宫修缮基金董事会,1990年),谢长寿编的《温陵白耆庙》(泉州市温陵白耆庙理事会,1998年),李玉昆的《妈祖史迹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范正义的《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吴幼雄、李少园主编的《通淮关岳庙志》(收录了许多关岳信仰的研究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编的《关岳文化与民间信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专著。另外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